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論文學流派領袖理想型「社會性格」及其聚眾效力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94-2411-H-004-051-

執行期間：94年08月01日至95年07月31日

執行單位：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

計畫主持人：侯雅文

計畫參與人員：邱怡瑄、廖婉茹

報告類型：精簡報告

處理方式：本計畫可公開查詢

中 華 民 國 95 年 9 月 18 日

論文學流派領袖理想型「社會性格」及其聚眾效力

The ideal social character and populace cohesiveness of leader of literary school

摘要及關鍵詞

摘要

Abstract

本計畫屬於探討文學流派聚眾效力的系列論題之一。此一系論題包括流派領袖的「社會性格」、「社會資源」，及其所處時代的「社會結構」。本計畫首先就「社會性格」的角度提出研究的論題：即探討文學流派領袖的社會性格，及其凝聚成員上的效力之間的關聯。相較於過去對文學流派的研究成果，大多偏向於詮釋流派整體或是領袖個人的理論主張與創作風格；本計畫另從文學社會學的進路，去探討文學流派領袖理想型「社會性格」的成素，及其在凝聚群眾上的效用。這樣的研究方向，具有創發性。

爲了使本計畫所建構的理想型「社會性格」及其「聚眾效力」的理論，既根柢於直觀的洞察，又不致流於過度主觀而抽象的概念陳述，因此，在研究方法的設計上，採取歸納與演繹交互論證的方式。首先，透過宏觀眾多中國文學流派領袖的經驗，從理論的層面，歸納提舉出文學流派領袖理想型「社會性格」的成素，分別爲「社會運動趨向」、「社會交際趨向」以及「文化理想趨向」，及其分別對應的聚眾型態；另一方面則選取明代格調派的領袖李夢陽、清代神韻派的領袖王士禛，以及常州詞派領袖張惠言等具有代表性的流派領袖，作爲範例，進行演繹性的論析。最後則歸納上述三個範例的論證結果，對前述的理想型「社會性格」及其「聚眾效力」的理論進行印證或修正。同時發展「性格成素趨向檢測表」，作爲輔助、參考的指標工具，以增加本計畫理論的操作性。

本計畫企圖建構文學流派領袖理想型「社會性格」及其「聚眾效力」的理論，以便提供文學流派相關問題研究的詮釋基模。預期這項成果，不但可以完密「中國文學流派學」的知識體系；更可以開拓文學社會學的新方向。未來除了參照此一基模，持續詮析其他個別古典文學流派領袖經驗，還將進一步應用在現代文學流派領袖經驗的診斷研究之上。

關鍵詞：領袖、聚眾、李夢陽、王士禛、張惠言、文學流派、社會性格

Key words：leader，populace cohesiveness，literary school，social character

報告內容

一、前言

「中國文學流派學」是本人未來所試圖建構的系統性知識。九十二年六月提出的博士論文《常州詞派構成與變遷析論》就是此一系統性知識第一階段的研究成果。在此一成果中，除了提出實構性文學流派構成與變遷的理論，並由此理論衍生出判別流派成員的方法；同時，藉由常州詞派此一範例，運用上述理論及方法進行判派。此一研究成果初步建立文學流派研究的詮釋基模，並提出「變遷終界」的觀念，以解決文學流派發展界限的問題。

在第一階段的研究基礎上，我們將進一步另就其他流派範例適用此一理論為題，進行個案性研究，如二〇〇四年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論明清「格調派」的變遷終界，即屬於此一研究取向。同時，也將進行第二階段的研究論題，此即由社會學的角度，探討文學流派「聚眾」的條件或因素及其「效力」之間的關聯。在這個論題上，我們將透過具範例性的文學流派領袖進行研究。俟這二階段均能累積出可觀的研究成果之後，我們將在此一基礎上，提出更高層級、更有概括性，而具普遍詮釋效力的流派理論。這是中國文學流派研究的最後階段，目標在於完成「中國文學流派學」的知識建構。

本次計畫乃屬於第二階段。在此一階段裏當可析分三個次論題：其一是文學流派領袖的「社會性格」、「社會資源」及其所處的「社會結構」。首先，我們將就文學流派領袖的「社會性格」及其「聚眾效力」之間的關聯進行研究。有關文學流派領袖的研究，國內外已經累積不少研究成果，不過大多集中在領袖所提出文學主張及其創作風格的論題；尙未見到有針對領袖的「社會性格」與「聚眾效力」進行深入而全盤的論著。探討此一論題的意義，在於找出流派領袖究竟該具有何種「社會性格」，方能在聚集群眾的層面，發揮較大的影響力？

底下，則就本計畫所根因的問題意識、所欲達成的研究目的，以及相關的前行研究成果，進行更詳細的敘述及評論。

二、研究目的

「文學流派」係指一群人基於共同的理念，在特定的社會文化關係下，操

作共通的文學行爲而形成的團體。順著上述的定義，則文學流派實兼具文學性及社會性的雙重意義。從文學性的意義來說，流派針對時代的文學議題，提出特定的回應，因此與其他文學群體產生區隔；從社會性的意義來說，流派成員之間的凝聚型態，決定了他們對文學發展方向所能發揮的影響程度。

既往的研究偏重詮析個別流派所提出的理論意涵、選集的標準以及創作風格。這類成果，有助於我們區辨不同流派在文學意義上的特色，卻無法幫助我們完滿地掌握流派聚眾的型態及其效力的社會性論題。在這個論題上，我們可探究的問題包括流派領袖和其他成員之間的互動行爲方式，及其凝聚程度之間的關聯。又那些要素可以影響領袖與成員之間並時性的互動行爲方式，因而成爲決定流派聚眾效力的根本原因。

本人在《常州詞派構成與變遷析論》第三章中，參酌眾多文學流派經驗而歸結出領袖與成員之間基於特定的文學行爲而建立的「特化性」社會關係，乃是流派構成的要件之一。並且透過「常州詞派」的範例研究，印證了流派領袖與成員在不同的互動行爲方式下所建立的社會或文化關係，及其衍生的凝聚型態。底下，先摘要說明之。

就常派的範例而言，流派成員之間的互動行爲，有下列四種：第一種是「威服性」的「師生關係」；第二種是「襄贊性」的「朋友關係」；第三種是「悅服性」的「傳受關係」；第四種是「共派性的成員關係」。這四種關係不僅是常派成員的具體經驗，同時也印證了文學流派成員之間特有的互動行爲模式。又這四種關係，必須建立在共同追求的詞學之「道」此一基礎之上。而領袖與成員之間的關係，乃集中於前面三種。在這三種互動行爲中，以「威服性師生關係」的「聚眾效力」最強。其次是「悅服性的傳受關係」或「私淑關係」。最弱的是「襄贊性的朋友關係」。至此，初步建立了成員之間互動行爲方式與流派凝聚程度之間的關聯，做爲評估流派影響力的理論依據。不過，在《常州詞派構成與變遷析論》這本論文中，我們主要的觀點放在區辨一般的「社會關係」與流派的「社會關係」之間的差異。因而沒有就影響流派成員的互動行爲方式，以決定流派聚眾效力的根本原因進行延伸性、細部深化性的探討。那麼左右流派成員互動行爲方式的基本要素是什麼？諸要素之間蘊涵何種關係呢？唯有解決這類根源上的問題，我們才能夠建立詮釋、評估流派聚眾效力的合理依據。當然左右流派成員互動行爲的要因及條件不止一個，本計畫擬先就流派領袖的「社會性格」(social character)此一要因進行探究。藉由論證流派領袖的「社會性格」與流派成員互動行爲方式、

凝聚型態之間的關聯，導出流派領袖的「社會性格」與「聚眾效力」之間的因果關係。基此，本計畫乃屬於建構「中國文學流派學」的系列性研究。

所謂的「社會性格」，係指人們在面對自己、他人以及事件的社會行為中，基於應然的價值判斷，所呈現的獨特的需求、性向或是態度。此一性格主體係經過文化教養與社會化過程的型塑，而表現在社會關係之中。就個殊文學流派領袖的「社會性格」而言，其內容必然千變萬化，不可勝記。然則當我們將問題的焦點集中在什麼是流派領袖理想型「社會性格」時，我們期望能提出理想的性格成素，並藉助具有代表性的流派領袖範例印證之，以便作為評析其他個殊流派領袖聚眾效力的依據。綜觀文學史上的流派經驗，我們發現明代「格調派」的領袖李夢陽在「社會運動趨向」上的「社會性格」較為突出，清代「神韻派」的領袖王士禛在「社會交際趨向」上的「社會性格」較為突出，而「常州詞派」的領袖張惠言在「文化理想趨向」上的「社會性格」較為突出，各據流派領袖理想型「社會性格」之一端，故而成為我們討論文學流派領袖「社會性格」的「範例」。

所謂「社會運動趨向」係指善於策略運作、結盟抗爭，透過集體行動以貫徹一己理念的態度。「社會交際趨向」係指樂於與不同身分、輩分、乃至不同意見者建立良好人際關係的態度。「文化理想趨向」係指在文化上對真、善、美價值理想的堅持與自我實踐的態度。上述我們所以舉李夢陽、王士禛、張惠言分別作為這三種性格成素的範例，只是取其特出而可印證之便，並非認定他們三人的性格只能分別對應其中一種。相反地，就他們實質的存在來看，大體兼具上述三種趨向，只不過在構派的過程中，某一性格成素的表現，程度較強。

以李夢陽來說，根據《明史·文苑二》的記載，「監司五日會揖巡按御史，夢陽又不往揖，且敕諸生毋謁上官，即謁，長揖毋跪」，又尚書韓文等人憂心劉瑾用事，夢陽進言，云「比言官劾群奄，閣臣持其章甚力。公誠率諸大臣伏闕爭，閣臣必應之，去若輩易耳」（《明史·文苑傳》），由此皆略可見出李夢陽善於策動群眾力量以貫徹一己理念或是達到某種訴求的強度。以王士禛而言，樂於參與詩社，與友朋酬和，吳梅村曾曰：「貽上在廣陵，晝了公事，夜接詞人」。據薛順雄《王漁洋新傳》，王士禛曾奉使南海西嶽等地，「所至皆訪其賢豪，會其雅士」。又其在禮部任職時，亦務求獎掖後進。凡此皆可見出王士禛善於建立良好人際脈絡的性格強度。至於張惠言，據《清史列傳·儒林傳下二》的記載，「年十四為童子師，修學立行，敦品自守」、「鄉會兩試皆出朱珪門，未嘗以所能自異，默然隨群弟子進退而已」。此外在《茗柯文稿》中，時時表現出對於「文化集體意識」

此一道德理想的自我期許與擔當。然則從「未嘗自異」、「默然隨群」等表現，已略可區辨他與李夢陽、王士禎在「社會性格」上的差別。由於「社會性格」有別，故上述三人與同時期所以構派的成員之間，形成了不同的聚合型態，此一論題本人在《常州詞派構成與變遷析論》中僅略提及，並未深究，因此值得擴大，並進行細部論述。上述僅約略舉例說明三人的性格特色，至於更詳密地詮析，則有待此一計畫的執行。

在西方社會學的論著中，有關「支配服從」或是「性格類型」的研究成果甚多。透過「支配類型」的分析，社會學者企圖建立不同領導型態的社會組織與支配效力之間的對應關係，做為分析當代國家政體的依據。例如韋伯(Max Weber)《經濟與社會》(Economy and Society)的「支配的類型」等等。此外，透過「性格類型」的分析，以及社會成員的性格組合研究，社會學家企圖說明社會穩定及變遷的軌則。例如巴烈圖(Pareto Vilfredo)《心靈與社會》(The mind and society)、芮斯曼(David Riesman)《寂寞的群眾》(The lonely crowd)等等。

文學流派，就聚眾的現象而言，具有若干社會團體的性質。因此上述「支配服從」以及「性格類型」的思維模式，的確啟發了本計畫探究流派領袖性格及其聚眾效力的思考進路。不過，我們要特別指出，「文學流派」不同於有明確組織的社會團體；所謂的流派領袖，主要以「文士」的身分居領導的地位，而非社會團體組織領袖的身分。流派成員的服從行為，大抵出自領袖精神的感召，因而具有自願性，不像其他社會團體組織的成員的服從行為，往往受規約制度所限，而表現出被動性。基此，討論文學流派領袖的聚眾效力，顯然必須更加注重其主體性格的發用。順此而下，本計畫並不援用特定社會學說，去對相關流派論題進行研究；相對地，我們將根據文學流派的獨特性，去對領袖的「社會性格」與「聚眾效力」之間的關係，進行創發性的思考。

為使本計畫具有可執行性，我們將在既有的研究成果上，提舉具有代表性的流派作為範例，進行論述。此處的研究成果，一方面指上述範例性流派及其領袖之相關史料的收集，另一方面指本人對這些範例性流派及其領袖所累積的論述。底下則就這二方面加以說明。就相關範例性流派的史料收集來說，我們分四類進行：第一類是指李夢陽、王士禎、張惠言自述性的史料，包括志向、抱負、對師長友朋晚輩的應對態度等等。目前我們已從個人文集、傳記等記載中獲致這類資料。第二類是指流派其他成員對上述三者觀感的他述性史料，包括評斷的內容、評價的高低等等。目前我們已從成員的個人文集、刊刻的序跋、傳記、府志

中獲致這類資料。第三類是指領袖與流派成員互動行為的史料，目前我們已從個人文集、傳記、序跋、府志、墓誌銘、年譜等等獲致這類資料。第四類是指現代學者對於上述三個流派領袖的研究論著以及相關明清文學史、清詞史、文學批評史、詞學批評史的著作。

就本人對這些範例性流派所累積的論述來說，首先，博士論文《常州詞派構成與變遷析論》一書中，為了解釋張惠言「詞學行為」所隱涵的「深層意識」，以及常派成員「特化性」社會文化關係二個論題，便已經廣泛而深入地閱讀了張惠言的個人文集、傳記資料、以及張氏與其他成員互動行為的相關史料，但是沒有深入詮析張惠言的「社會性格」。除了已經完成的具體研究成果，此一研究閱讀經驗將有助於我們進一步執行張氏「社會性格」與「聚眾效力」的分析工作。其次，九十三年度國科會專題計畫〈論明清「格調派」的變遷及其終界〉已獲核定並執行中。此一計畫的目的在於合理而有效地辨析「格調派」在發展的過程中所呈現的各種歧異。並提出「格調派」的「變遷終界」以便總括其發展的範圍。為了解決這個論題，我們必須從「詩學行為」、「深層意識」以及「特化性」社會文化關係三方面，去建立「格調派」的構成內容，以做為討論「變遷」的依據。其中，「特化性」社會文化關係，就是處理李夢陽與其他成員之間的互動行為方式與凝聚效力的論題。預計明年(民國九十四年八月)我們將提出相關研究成果報告。此一研究經驗，將有助於我們進一步執行李夢陽「社會性格」與「聚眾效力」的分析工作。至於「神韻派」，本人在建構「實構性文學流派構成與變遷理論」時，曾以其為範例，而略加研究。對於本計畫而言，並不在於對整個「神韻派」的議題進行全面的探究，而僅就其中王士禛的「社會性格」與流派成員互動行為方式的論題進行研究。未來應可參酌前行學者相關的研究成果，執行本計畫的論題。同時此一研究成果，更可做為未來全面建構「神韻派」的基礎。

基於上述的問題意識，本計畫的研究目的有下列四端：

(1)、合理地提出文學流派領袖理想型「社會性格」的成素。本計畫的目的之一在於探究流派領袖的「社會性格」，則對於此一概念，不能僅作籠統且抽象的論述，而必須將之轉化為可被操作的定義。同時，定義的結果必須和我們由「社會行為」的角度所建立起來的流派構成理論之間，形成相容相即的關係。其重要性在於提供一套合理的流派領袖理想型「社會性格」的論點，以方便本計畫的論述工作，同時也做為日後學術檢核與對話的依據。上述「社會運動趨向」、「社會交

際趨向」、「文化理想趨向」便是爲了滿足操作性定義及流派構成理論印證之需要而產生的「性格成素」。

(2)、建立文學流派領袖「社會性格」與流派成員互動行爲方式的關聯。領袖與成員之間不同的互動行爲方式，往往產生不同的聚眾效力，關於這一點，本人在《常州詞派構成與變遷析論》中已經進行初步的論證，但是對於相關延伸性的論題，並未進行細部論述。本計畫正是在《常州詞派構成與變遷析論》的基礎論點上，進一步延伸擴大相關論題並進行細部探究。有關領袖與成員之間互動行爲方式的取向，實與流派領袖的性格有密切的關係。本計畫的目的之二在於進一步詮釋「社會運動趨向」、「社會交際趨向」以及「文化理想趨向」各自分別對應何種特定互動行爲方式，藉此建立領袖的「社會性格」與「流派成員行爲互動方式」的關聯模式。其重要性在於做爲本計畫推導「社會性格」與「聚眾效力」之間因果關係的依據。

(3)、建立文學流派領袖「社會性格」與「聚眾效力」之間的因果關係。就流派的「聚眾效力」而言，大抵可分從二方面觀察：其一是內向垂直凝聚，其二是外向水平延展。本計畫的目的之三，便是在上述議題的結論下，進一步導出不同的「社會性格成素」，與「內向垂直凝聚」、「外向水平延展」之「聚眾效力」的對應關係。其重要性在於做爲本計畫建構文學流派領袖理想型「社會性格」及其最大「聚眾效力」的依據。

(4)、提出文學流派領袖理想型的「社會性格」及其「聚眾效力」。本計畫的目的之四在於論證文學流派領袖理想型「社會性格」應當綜備「社會運動趨向」、「社會交際趨向」以及「文化理想趨向」，而且三者均呈現非常強度，如此方可能發揮最大「聚眾效力」。其重要性在於從理論上提供理想型的文學流派領袖，以作爲日後評估個別流派領袖的依據。

三、研究方法

爲了達到上述第一個研究目的，我們將採取歸納與演繹交互論證的方法，並且參考「性格成素趨向檢核表」的辨識結果。首先我們將在流派構成理論的基礎上，基於對普遍文學流派行爲性質及活動場域的直觀洞察，歸納提舉出「社會運動趨向」、「社會交際趨向」、「文化理想趨向」做爲預設性的「社會性格成素」此一理論。其次發展「性格趨向檢核表」，設計若干性格成素辨識項目，做爲區

別流派領袖「社會性格」的趨向以及強度的參考指標。爲了使「性格趨向檢核表」在辨識領袖性格時，能夠發揮最大的審辨及區隔效力，我們將從眾多流派領袖與成員互動的行爲經驗，提舉出具有典型性的行爲項目。再則選擇具範例性的流派領袖，以本計畫而言，即指明代格調派李夢陽、清代神韻派王士禛、常州詞派張惠言，進行辨識，以便印證或修正上述預設的性格成素理論。最後，則總結歸納或修正此一性格理論內涵。

有關此處所採取的研究方法，我們將特別做如下的說明：本計畫雖然旨在建立一套文學流派領袖理想型「社會性格」的理論，但是不希望此一理論完全只是研究者主觀認定而成。相反地，我們希望此一理論，可以提供再操作的可能，藉此與學術界其他學者進行對話，從而修正此一理論的不完備處。因此我們才會參酌社會學以及心理學的研究方法，發展「性格成素趨向檢核表」，作爲參考性的研究方法，期望可以增加本計畫理論的可操作性，以及詮釋有效性。不過，我們也深深了解到量表統計的方法，對於人文學的研究上，將可能產生過度機械化、形式化的弊端此一難題；因而對這項研究方法所得到的成果，我們將列爲參考性的指標。換而言之，本計畫雖以量表統計的方法，增加詮釋客觀性；但是我們認爲像文學流派領袖社會性格等這一類人文議題，研究者本諸眾多流派經驗的閱讀基礎，所展現的主觀洞察與體悟才是根柢。是故，上述本計畫所提出的三種「社會性格成素」，即有本諸主觀洞察與體悟之處，而不能認定爲絕對客觀的結論。

爲了達到上述第二個研究目的，我們將採取歸納及演繹交互論證的方法。首先，我們將就前述「流派構成與變遷的理論」中，對文學流派領袖與成員之間的互動行爲方式的三種類型：「威服性」、「悅服性」、「襄贊性」，與上述個別「社會性格成素」之間的關係，進行預設性的連結。再則透過具範例性的流派經驗，以本計畫而言，即指明代格調派李夢陽、清代神韻派王士禛、常州詞派張惠言，進行細部的論析，以便印證或修正上述預設的關聯。最後，則總結歸納或修正文學流派領袖「社會性格」與流派成員互動行爲方式的關聯。

爲了達到上述第三個研究目的，本計畫將在已有流派互動行爲方式與凝聚型態對應之研究成果的前提下，參酌第二個研究目的所獲致的成果，建立流派領袖社會性格趨向與聚眾效力之間的因果關係。並且就具範例性的流派經驗，以本計畫而言，即指明代格調派李夢陽、清代神韻派王士禛、常州詞派張惠言，儘可能地從地區範圍及親疏遠近的人際網絡，全面考察其聚眾的範圍及程度，以便印

證或修正上述的因果關係。

爲了達到上述第四個目的，本計畫將總結以上三個研究目的所獲致的成果，比較上述三種「社會性格成素」在聚眾效力上所呈現出來的優點及缺點。然後提出文學流派領袖理想型「社會性格」，並合理推估最大、最強的聚眾效力。

四、文獻探討

本計畫的目的，在於建構一套奠基於中國文學流派經驗之上的領袖理想型「社會性格」理論。綜觀國內外研究成果，並未見到針對此一論題進行全盤性探究的專著，因而本論題具有創發性。然而，欲證成此一論題，必須倚賴具範型性的文學流派領袖經驗。基此本計畫選擇了明代格調派的李夢陽、清代神韻派的王士禛及常州詞派張惠言爲研究對象。就這三個文學流派領袖而言，國內外已經累積出了不少兼具質量的研究成果，可作爲本計畫的研究基礎。底下，我們將先概述國內外相關研究成果，然後進行評述。

有關上述三個文學流派及其領袖的研究成果，大致可以分爲下列四種型態：

第一類係概括性地介述各文學流派的興起與承變。例如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黃保真、成復旺、蔡鍾翔合著《中國文學理論史》、張少康、劉三富合著《中國文學理論批評發展史》等，均分別就理論主張或創作風格對上述三個流派進行論述。其他如方智範、鄧喬彬、周堅偉、高建中合著《中國詞學批評史》、王易《詞曲史》，則專就詞學理論或作品風格的角度，對於詞史上所出現的流派進行介述。

第二類係從斷代的角度，針對該時期文學發展的趨向進行深入地論述，對於李夢陽、王士禛、張惠言等人及其流派僅以專章處理。例如簡錦松教授《明代文學批評研究》、吳宏一教授《清代詩學初探》、嚴迪昌《清詞史》等。或是因爲特定主題的設定，有涉及李夢陽、王士禛或張惠言其中任何一人的理論，因而加以論述的著作。例如蔡英俊教授《中國古典詩論中「語言」與「意義」的論題——「意在言外」的用言方式與「含蓄」的美典》等等。

以簡錦松教授的《明代文學批評研究》而言，該書以明代成化至嘉靖間的文壇情勢爲研究對象，從政治階層、地域集團、文學理論的角度探析明代文學流派形成的社會文化背景及其文學主張。其中第四章「復古派」、第五章「復古派之性格試論」，即是以李夢陽等七子爲討論的對象。又吳宏一教授《清代詩學初

探》，主要探究清代重要文學家的文學論述。其中第五章「神韻說及同時的詩論」，即是以王士禛為主，探討其師承交遊與「神韻說」的理論意義。至於嚴迪昌《清詞史》，則綜述了清代詞體創作的發展面向，其中第四編第一章「常州詞派的發展歷程」，已略述了張惠言及並時常派成員創作上的成就。相同研究類型的論著另見張健教授《明清文學批評》、袁震宇、劉明今合著《明代文學批評史》、唐富齡《明清文學史》、劉世南《清詩流派史》、張宏生《清代詞學的建構》等等均屬之。

以蔡英俊教授的《中國古典詩論中「語言」與「意義」的論題——「意在言外」的用言方式與「含蓄」的美典》而言，該書主要參酌當代有關「語言」與「意義」的理論概念，重新考察古典詩論中有關「意在言外」、「含蓄」、「寄託」與「神韻」的詩學觀念。其中第四章第三小節論「『神韻』的概念與『情』、『境』的興會」，即涉及了王士禛的詩論。相同研究類型的論著如郭紹虞《中國詩的神韻、格調及性靈說》等等均屬之

第三類係以單一文學流派本身或其領袖為主體，進行深入的討論而完成的專著。以「格調派」為例，如陳國球教授《唐詩的傳承——明代復古詩論研究》便以是李夢陽等前後七子的詩論及相關唐詩選本為主，依不同的文類體式，建構以李夢陽為首之文學流派的詩學體系。廖可斌《復古派與明代文學思潮》，則依照歷史發展的順序，詳究前後七子興起的歷史條件及其文學理論內容。又簡錦松教授《李何詩論研究》已針對李夢陽與何景明這二位復古派的領袖人物，從生平、交遊以至文學主張均進行探究。以「神韻派」為例，如黃景進教授《王漁洋詩論之研究》，則分別從生平、性情、為人處世、文學主張等不同層向，全面地考察王士禛在清代文壇上的地位及成就。胡幼峰教授〈王士禛「詩觀」三變與錢謙益的關係〉則就文學主張的層面，考察王士禛與錢謙益之間的承變關係。國內以王士禛之詩論為研究對象而撰寫的學位論文甚多，例如龍思明《王漁洋神韻說及其詩的成就》、李致諭《王士禛「神韻說」研究》。國外如日本漢學、香港地區的學位論文等亦對上述二個流派及其領袖有相當具參考價值的研究成果，可見於「主要參考文獻」。以「常州詞派」為例，吳宏一教授《常州派詞學研究》，該文收錄於《清代詞學四論》，則分別從「時代背景」、「詞論探究」、「詞論反響」三部分，對常派的流變進行論述。徐楓《嘉道年間的常州詞派》，則詳究了張惠言、董士錫、周濟三人在詞論上的承續關係，並探究了常派的創作風格。葉嘉瑩教授〈常州詞派比興寄託之說的新檢討〉，該文收錄於《中國古典文學評論集》，則就「比

興寄託」此一詞論觀念，去對張惠言及周濟的承變關係進行探究，並予以評價。日人伊藤虎丸〈張惠言的以「雅俗」觀念為中心的詞論——《詞選》的位置〉，該文收錄於《內野博士還歷紀念東洋學論文集》（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則針對張惠言《詞選》中所流露的「雅俗」觀念，與浙派進行比較。其他如龍榆生〈論常州詞派〉、朱美郁《常州詞派比興說研究》等等均屬之。

第四類則是對文學流派研究成果進行後設性的研究，或是相關史料彙整研究工作。例如陳國球教授〈明清格調詩說的現代研究〉、顏婉雲教授〈明清兩朝有關前七子生平文獻目錄〉、林玫儀教授《詞學論著總目》等，提供了本計畫在史料收集上的寶貴資訊。

底下，我們將對上述前三類研究成果進行評述。此處的評述係針對本計畫的論點而來，因此除非與本計畫有直接關係，否則對於上述研究成果所預設的研究立場以及評價性的論斷，則予以保留，暫不討論。本計畫的目的，在於論證文學流派領袖的「社會性格」及其「聚眾效力」的關係，順著上述研究背景的論點，則我們將特別關注流派領袖與成員之間的交往事實，以及彼此之間在文學的場域上互動行為的方式。

從這個角度來說，上述第一類型的研究成果，由於屬於概括性介述的著作，因而對這方面的論題所能提供的幫助較少。至於上述第二、三類研究成果，與本計畫具有較直接關係者，係指流派成員歸屬以及生平交遊的論述。例如簡錦松教授《明代文學批評》第五章第二節曾概略討論了李夢陽「氣節」方面的性格。《李何詩論研究》第三章「交遊與詩論發展」，藉著李夢陽為顧璘所作〈朝正倡和詩跋〉，推論李夢陽有意提高自己為領導人物的結論，並且附錄了「李夢陽、何景明年譜簡編」，有助於我們掌握李夢陽與流派其他成員的交往事實。吳宏一教授的《清代詩學初探》第五章第一節以及第二節分別就王士禛「師承交遊」、「同道者」進行論述。又其《清代詞學四論》曾對王士禛的詞集與詞論進行研究，文後附錄了「王士禛文學年表」，亦有助於我們掌握王士禛與當時文士交往的事實。劉世南的《清詩流派史》，亦曾就「王士禛的生平」與「神韻派及其影響」進行探究。而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黃景進教授在《王漁洋詩論之研究》第二章第一節所提出「傳統型人格」，該文藉由分析王漁洋「和易寬簡」等性情以及「善獎引後輩」等為人處世的表現，將王士禛定位為理想的「傳統型人格」。此一人格理論的結論十分具有參考價值。

然而，或是由於研究視點的設限，上述前三類的研究成果主要偏向於單一

流派或是單一流派領袖的文學理論與實踐內容的探究，雖然少數已觸及個別流派領袖「生平交遊」以及「性情」的史料，卻未能從「聚眾效力」的觀點，將其間所隱涵文學流派領袖理想型「社會性格」的理論意義建構出來。於是有關領袖「生平交遊」的事實考察，或是停留在零星重要的交往片斷；或是雜列所有的交往經驗，而不審辨是否皆可判入流派成員的互動範圍之中。對此，本人《常州詞派構成與變遷析論》，已經提出「判派」的依準，針對常派成員的交往經驗進行審辨，並且詮析其間所隱涵互動行為方式上的意義。又本人九十三年度〈論明清「格調派」的變遷及其終界〉，已著手研究明清「格調派」派判的依準，並針對格調派成員交往經驗進行審辨，以及詮析其間所隱涵互動行為方式上的意義，預計明年（九十四年八月），提出相關成果報告。至於清代「神韻派」的「判派」依準，以及成員之間互動行為方式的問題，尙未獲得全盤性的解決，因而成爲執行本計畫時必須加以探究的前置性論題。等到上述三個流派的「判派」問題獲得解決，便可進行本計畫主要的論題，即探究文學流派領袖理想型的「社會性格」。透過此一研究，可以賦予前述流派領袖「生平交遊」以及「性情」的史料新的意義。

此外，在上述第三類研究成果中，如黃景進教授已經從單一文學流派領袖的經驗，提舉出具有普遍理論意義的人格理論。然則，這類理論缺乏建立具體的性格指標，以及性格強度的判準，以供學術對話及操作，因而不便應用於其他流派領袖的經驗分析。此外，此一人格理論的研究成果局限於單一流派領袖經驗，因而不能將文學流派領袖理想型「社會性格」全盤建構出來。

除了上述有關「格調派」、「神韻派」及「常州詞派」的研究成果與本計畫相關；另外有些泛論「文學史觀」的著作，也涉及「文學流派」的議題，因而也與本計畫相關，故有必要加以評述。例如朱德發《主體思維與文學史觀》，該書上篇發微之五「堅持與拓展：文學流派研究的社會學方法」，僅以十六頁的篇幅，泛論文學流派研究的各種論點。而且，該文僅作抽象理論概念的陳述，缺乏實際文學流派經驗的印證。又雖然提及「主體意識」對於流派發展的主導性；然而此一概念與本計畫所謂「社會性格」並不相關。綜上可知，不管在研究的數量、研究的深度或是研究方法上，有關建構文學流派領袖理想型「社會性格」的論題，尙留下相當多的研究空間，實在值得進一步的探究。

五、結論

綜觀「格調派」所以構成，李夢陽實為領袖人物。至於李東陽強調「詩文辨體」，以及「時代格調」，這些並非李夢陽等人所構成之「格調派」最核心的觀念，故不宜以李東陽的詩論做為「格調派」所以構派的標準。如欲提出「格調派」所以構派的標準，應該先探討李夢陽的「詩學體系」。有關這部分的論題，可以簡錦松〈李夢陽詩論之「格調」新解〉為代表，該文對於李夢陽有關「格調」的論析，頗為詳細。然而「格調」只是李夢陽詩學之一端，不足以見其體系。故而對此一論題，有再深究的必要。

我們就《空同先生集》，試圖建構李夢陽的「詩學體系」，已有具體的成果。並於二〇〇五年八月北京首都師範大學文學院所舉辦之「中國古代文藝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中發表。論文題目為「論李夢陽「和」為中心的詩學體系(之一)——以「和」為依據所規制的詩歌本質與功能」。

本文以為李夢陽以「和」為中心所建構的詩學體系，在本質上，規制詩歌構成的要素有七：分別是「格、調、氣、句、音、思、情」，其中以「情志」做為根本。前述六項要素所構成的創作活動乃是基於情志的發用而產生；而創作活動的完滿亦正體現了情志的和諧。欲達成創作活動的完滿，則有賴這六個要素和諧統一。這六個要素能和諧統一的條件分別為「古、逸、舒、渾、圓、沖」，因此這六個條件就成了創作活動的理想規範。

至於這七個構成要素及其條件的意義，可概述如下：「格」指向詩歌的理想體式，「調」指向作品完成後總體聲律美感。此一美感既必須符應時代、地域的特質，又必須符合理想的詩體。至於「氣」指所欲貫入作品中，本諸情志而表現出來的生命力。「句」、「音」則針對實際創作時，形式結構與聲律等語言本身而言。「思」指向總體創作構思。至於「情」則指在進入創作而形諸語言之前，感物而生的創作動力與經驗素材，故云「以情發之」。如依前文所論及之「志」，則「情」必以理性反思之志為其節度，而情志辯證融合為「和」的狀態，才是作品所要表現的理想內容。至於「氣」、「句」、「音」、「思」則指語言表現時，各單元要素。分解而言，各單元要素本身都要以「和」為理想質性。綜合而言，則在「和」的原則下，各要素之間構成和諧的整體。而最終表現成自然天和的古格逸調。這就是李夢陽整全的詩學體系。

在此一本質的規制下，李夢陽以為詩歌應該可以發揮如下的功能：(一)、詩歌具有觀政與知俗的功能；(二)、具有感發善心的功能；(三)、可以引起個體之「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順此而下，李夢陽在「創作法則」上提出特定的主張。他以為理想的作品，應當兼顧對立性的表現手法與藝術技巧，以便營造渾融而又和諧的整體風格。如此方能符應前述的詩歌本質，因此他提出「前疏者後必密，半闕者半必細，一實者必一虛，疊景者意必二，此予之所謂法」，並認定這符合「物之自則」。

相較於何景明而言，李夢陽著重的是經過理性節制的性情，以及均衡和諧的詩歌形式。然而何氏著重的是個人才性的發用，以及不受拘束的創意。從這個角度來看，何景明對李夢陽的辯難，實已呈現「格調派」的「變遷終界」。

稍後如黃省曾、李攀龍對於李夢陽的推崇，顯示了固守李夢陽詩論的趨向。至於王世貞所提出「才性」的觀點，顯然偏向了何景明，不過由於他仍然對李夢陽表示推許之意，故而雖趨向變遷終界，然而尚未到達終界。可是王世懋等人，明白地表示李夢陽「詩體法則」不可守，則已逸出變遷終界之外，不當在列為「格調派」了。

時至清代，沈德潛〈本朝館閣詩序〉提出「風格各殊，體裁異制」，講求「聲必和平」的論點，似乎有近同於李夢陽之處。然而他將詩歌的本質，統歸於政教忠愛之情，這與李夢陽所論情志兼融「儒家群己不二的情志」和「道家自然無偽之真情」相比，並不相近；又其所謂的「和平」，偏重含蓄的表現手法，與李夢陽所強調對立而又和諧的詩體風格，並不相涉，故不適宜歸入「格調派」。關於這一部分的論題，未來將撰寫專文，在學術期刊上發表。

參考文獻

本計畫所參考之文獻甚多，茲舉重要者如下：

一、「格調派」主要成員的著作

空同集 明·李夢陽 台北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空同集 明·李夢陽 台北偉文圖書出版社有限公司

大復集 明·何景明 台北世界書局

何大復先生全集 明·何景明 台北偉文圖書出版社有限公司

談藝錄 明·徐禎卿、何文煥輯《歷代詩話》本

唐詩選 明·李攀龍著、日本森大來評釋 台北河洛出版社一九七四年

弇州山人四部稿 明·王世貞 台北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四溟詩話 明·謝榛 《歷代詩話續編》本
藝圃擷餘 明·王世懋 台北廣文書局 稽留山輯《古今詩話》本
詩藪 明·胡應麟 台北廣文書局 一九九九年
唐詩別裁集 清·沈德潛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
說詩碎語 清·沈德潛

二、現今相關學術論著

甲、專書

中國詩的神韻、格調及性靈說 郭紹虞著 台北華正書局
中國文學發展史 劉大杰著 台北華正書局
中國詩論史(原支那詩論史) 鈴木虎雄著、洪順隆譯 台北商務印書館
中國詩論史(原支那詩論史) 鈴木虎雄著、許總譯 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
清代文學評論史 青木正兒著、陳淑女譯 台灣開明書局
中國文學理論史 黃保真、成復旺、蔡鍾翔合著 台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清代文學批評史 鄔國平、王鎮遠合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代詩學初探(修訂本) 吳宏一著 台北學生書局
說詩碎語詮評 蘇文擢著 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明代文學批評研究—成化、嘉靖中期篇 簡錦松 台北學生書局
明前七子文學理論研究 邵紅 台北學海出版社
唐詩的傳承—明代復古詩論研究 陳國球著 台北學生書局
沈德潛詩論探研 胡幼峰著 台北學海出版社
李攀龍文學研究 許建崑著 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復古派與明代文學思潮 廖可斌著 台北文津出版社
明代前後七子研究 陳書錄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說詩碎語論歷代詩 朱自力 台北里仁書局
王世貞研究 黃志民著 政治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明代七子派詩文及其論評之研究 龔顯宗 文化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
明清格調詩說研究 元鍾禮 台北台灣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

明前後七子詩論析評 顏婉雲 香港大學中文系博士論文
明清格調詩研究 吳瑞泉著 台北東吳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
四溟詩話研究 何永清 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
文體論纂要 蔣伯潛 正中書局
文體論 薛鳳昌 商務印書館
中國古代文體學 褚斌杰 台北學生書局
文學批評的視野 龔鵬程 大安出版社
文體與文體學 Graham Hough 著、何欣譯 成文出版社
常州詞派構成與變遷析論 侯雅文 國立中央大學中文所博士論文
六朝文學觀念論叢 顏崑陽 台北正中書局
中國文學流派史 馮明之 台北源流出版社
嚴羽及其詩論研究 黃景進 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中國古典詩歌中「語言」與「意義」的論題——「意在言外」的用言方式與「含蓄」的美典 蔡英俊 台北學生書局
中國文學的美感 柯慶明 台北麥田出版社
王弼州其及文學理論研究 張淑娥 台南南一書局
明代文學 錢基博 台灣商務印書館
唐詩學探索 蔡瑜 台北里仁書局

乙、期刊論文或其他單篇論文

明代復古派與唐宋文派之潮流 夏崇璞 學衡 11 年 9 月
明人文學批評王元美的論詩 剛宓 庸報 27 年 9 月
明代文學復古之論戰 吳重翰 廣州大學學報 38 年 3 月
明代前後七子的復古(一) 王貴苓 文學雜誌 47 年 1 月
明代前後七子的復古(二) 王貴苓 文學雜誌 47 年 2 月
略談明七子的文學思想與李何的論爭 江海學報 51 年
王世貞的文學評論 施隆民 女師專學報 64 年 5 月
沈德潛的格調說 吳宏一 幼獅月刊 1976 年
後七子交誼考 許建崑 東海中文學報 68 年 11 月
李攀龍及其《古今詩刪》研究 楊松年 中外文學 70 年 2 月

從前七子到王夫之：論古代兩大詩學思潮的匯流 蕭馳 學術月刊 72 年
李東陽的詩論 鄭毓瑜 中外文學 72 年 8 月
沈德潛詩述評 廖仲安 文學遺產 73 年 6 月
明清兩朝有關後七子生平文獻目錄 顏婉雲 書目季刊 74 年 6 月
沈德潛「格調說」的來源及理論 李銳清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 74 年
論沈德潛的詩 范建明 蘇州大學學報 75 年
「格調」源流辨略 祝峰 廣西師院學報 76 年
謝榛的美學思想 李慶立 山東齊魯學刊 76 年
明代前後七子的審美情感論——從「因情立格」到「發抒性靈」的流動結構 陳書錄 學術月刊 77 年
唐詩選本與明代復古詩論 陳國球 東方文化 77 年
明代復古詩論的文學史意識 陳國球 文藝理論研究 78 年 3 月
沈德潛《說詩碎語》研究 吳宏一 國立編譯館館刊 79 年 6 月
格調派唐詩觀的形成與發展——明代唐詩批評史研究之一 朱易安 上海師範大學學報 80 年
後七子和明末文人的唐詩觀——明代唐詩批評史研究之二 朱易安 上海師範大學學報 80 年
關於李夢陽「晚年自悔」問題 廖可斌 文藝理論研究 80 年
格調範疇的意義——兼論它對風骨理論的貢獻 汪涌豪 古代文學理論研究 81 年
謝榛的詩歌繼承與創新觀散點透視 李慶立 山東師範大學學報 81 年
明代詩文創作與理論批評的交叉演進 陳書錄 文獻 82 年
清代詩論家論明代前後七子 鄒傳恕 華中師範大學學報 82 年
明代格調派詩論中的「杜詩集大成」說——以李東陽《懷麓堂詩話》為論述中心》
連文萍 國立編譯館館刊 83 年 6 月
前七子衰微的內部原因探析 王承丹 南都學壇 85 年
明「後七子」結社始末考 山東師大學報 85 年
明代「格調」詩說研究知見書目 陳國球 書目季刊 89 年
明清格調詩說的現代研究 陳國球 古代文論研究的回顧與前瞻 91 年

研究計畫自評

本計畫目的在於確立「格調派」的變遷終界，以便解決前行相關論著中，有關「格調派」成員認定不一的問題。並藉由論析此一流派經驗，進一步印證「實構性文學流派構成與變遷理論」，進而完成建構「中國流派學」的系統性知識。基此，我們已透過詳析流派領袖的詩論意義，並提出了構派的依據，可以進一步判別「格調派」不同的變遷趨向。

該研究成果，將李夢陽以和爲中心的「詩學體系」完整地建構起來，並且分析其間所包涵的各種要素，及相互之間的關係，可以補充前行研究過度偏重「格」、「調」二個概念的不足之處；並且修正明清以來，從模擬字句概括李夢陽詩論之意義的偏失。未來，我們將持續就李夢陽的「創作法則」以及「典範塑造」等相關議題，撰寫專文發表，以便完整呈現「格調派」構派的依據及「變遷終界」。在這項研究計畫的執行過程中，上半年由二位碩士生，下半年由一位碩士生，二位大學生擔任助理。由他們收集相關學術論著，並建立電子檔，以便作為發展中國文學流派學資料庫的基礎。透過這項訓練，可以讓這些對於明清文學研究有興趣的學生，掌握相關學術社群的研究概況。同時在辨析學術論著對本論題的重要性時，往往經過來回討論，凡此有助於學生日後收集、鑑別資料的能力。